

餐饮业复苏对“三农”意味着什么？

□□ 巩淑云

近日，一些地方领导高调自费“下馆子”的新闻大量出现，南京市委书记在夫子庙景区吃了一碗鸭血粉丝，并带头堂食；昆明市委书记在一家“老字号”商铺购买了午餐肉，还在购物中心点了当地特色美食；焦作市市长在大杨树商业街品尝了焦作特色小吃……

人是铁、饭是钢，人们都是要吃饭的，但领导干部们此时如此高调“逛吃”，是特殊情况下为了形成示范效应以引导百姓进行消费，也释放了当下复工复产工作的新信号：复工复产要和扩大内需结合起来，要把被抑制、被冻结的消费释放出来，使实物消费和服务消费得到回报。

投资、消费、出口被誉为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其中，消费在2019年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7.8%，并连续6年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主引擎”。而在消费市场中，餐饮业占有重要的地位，约占社会零售总额的11.3%。疫情对各行各业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而餐饮业呈现断崖式下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1-2月份，全国餐饮同比下降43.1%，增速较上年同期下降52.8个百分点。当前，各地各行各业都在加快推进复工复产，餐饮业的复工率落后于其他产业。因此，为了扩大内需，挖掘被压抑、被冻结的消费，餐饮业的复苏值得大力推进。

2020年，一场疫情，让人们对农业“稳定器”“压舱石”的作用有了深刻的认识；2020年，是决胜脱贫攻坚之年，也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都是重中之重的工作。这些工作，与餐饮业的发展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站在农业的角度，餐饮业是农产品出村进城的主要去处。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反作用于生产。消费低，生产就会萎缩。餐饮业断崖式下跌直接将压力传导到农业生产上，蔬菜等农产品、食品加工企业产品等受到极大影响，导致滞销积压，尤其是对养殖业影响巨大。餐饮业的复苏无疑能够缓解以上问题，增加农业生产收入的同时，带动一二三产业有机运转。

站在农村的角度，餐饮业是乡村新业态的有机组成部分。农村不只有农业，还有农产品加工业、服务业等新业态，这些构成了农村环环相扣的产业链。服务业中吃、住、行、游、购、娱几大要素中，“吃”排在了首位。餐饮业恢复正常了，农村的食品加工业才能恢复正常；“农家乐”等复苏了，市民的消费信心回来了，乡村服务业才能有序发展。

站在农民的角度，餐饮业是农民进城务工的主要行业之一。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

2020年，是决胜脱贫攻坚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与餐饮业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餐饮业是农产品出村进城的主要去处，是乡村新业态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农民进城务工的主要行业之一。餐饮业复工复产，对“三农”影响重大。

比重进一步上升，2018年就已达到52.2%，服务业就业人员达到35938万人，比重达到46.3%，成为我国吸纳就业最多的产业。其中，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是第三产业中吸纳就业的主要渠道。然而受疫情影响，1-2月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下降13%，两个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3%和6.2%。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3月19日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已有1亿农民工外出务工，还有20%春节前返乡农民工未返岗。无疑，餐饮业的恢复能够提供更多的复工岗位，拉动农民工充分就业。

餐饮业地位重，对“三农”影响大，但是复工迟、复工率低，在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向好的情况下，就政策而言，要适时按下餐饮业复工复产的“快捷键”。当然，全国防疫形势有差别，湖北（主要是武汉）、北京依然是疫情防控的重点区域，这些地区餐饮业复工复产要有更加精细的操作。但全国多数地区，已经属于低风险地区，这些地区餐饮业复工复产，在做好必要防护的前提下，步子可以快一点，不要让餐饮业拖了全面复工复产的后腿。尤其是乡村较之于城市，人员没那么密集，空间

没那么紧凑，食材运输距离近，劳动力充足，有序恢复餐饮业可以从乡村开始。

餐饮业复工复产，离不开农产品运输和服务的人员。但一些低风险的农村地区，还在设置不必要的防疫关卡；一些地区之间，健康证明不能互通互认；一些地方对返城人员一律收取隔离费用等。所有的这些，都不利于食材进城和农民返城复工，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如此困境：一边是餐饮业急需用工用料，一边是农产品和农民工进不了城，但双方就是难以对接。因此，有必要打通低风险地区之间的人员和货物流动的“堵点”，取消不必要的障碍设置。

餐饮业复工复产，离不开消费者。消费是生产的目的和归宿，餐厅需要有人来吃饭才能算真正的“复市”。然而，前几日扎堆喝茶被批评的新闻还在眼前，突然之间被鼓励“吃吃喝喝”了，很多老百姓还不了解情况，因此仍处于“防控惯性”中“不敢消费”。站在这个角度，一些地方领导带头“下馆子”，可以起到示范作用，带动市民消费。同样，农民工既是服务人员也是消费者，他们就业充分了，餐饮消费也会增加。

餐饮业复工复产，也离不开信心。领导“逛吃”不仅能起到示范作用，还能提振消费者信心，向群众传递当前疫情防控形势整体向好信息，复工复产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未来一段时间，在做好防控疫情反弹工作的同时，可以引导消费者进行有序消费。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农民工的收入情况不容乐观，当然，全年的具体情况如何，还要看复工进度与宏观经济发展。尽管可能有短期波折，但从长期看，农民工收入不断增长的总体趋势，是不会改变的。因此，其所产生的各种影响，也是不会改变的。

根据国家统计局部门数据，201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9077万人，人均月收入3962元。而在2009年，农民工月工资才1417元。10年提高了1.8倍。从绝对值看，平均每年月工资提高255元。农民工工资上涨，对于农民家庭收入增长是大好事，至关重要。我国农民净收入中，来自外出打工的工资性收入所占比例不断提高；2006年为38%，2019年为41%。而来自养殖业的净收入比例大幅度下降，从43%降低到24%。

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包括两个因素：外出打工人数的增加和人均工资水平的提高。其中，外出打工人数近10年来的增加不到30%，而人均工资水平的提高为1.8倍。农民工工资水平的提高，是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

我国城乡人均收入的比值，从最高时2009年的3.33，缩小到2019年的2.64，农民工工资的上涨功不可没。

不过，与此同时，农民工工资上涨也直接拉升了农村劳动力价格；农业用工的成本，不断上涨。

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新疆的人工摘棉花成本。早些年，摘一公斤棉花，人工费是5毛钱。后来，逐渐上升到1元、1.5元、2元，乃至2.5元。粗略估算，棉花采摘环节的人工成本，最高时占到棉花销售价格的40%。

人工采摘棉花成本剧增，一方面，导致了新疆棉花采摘的快速机械化，另一方面，也大大改变了我国棉花种植的区域结构。

2019年，新疆棉花产量已经占到了全国总产量的85%，而东部地区棉花生产急剧萎缩。曾经的种棉大省河南省，棉花种植面积从90年代初期的1800万亩，减少到现在的50万亩。东部地区棉花生产急剧减少的根本原因，是规模太小、难以机械化，劳动成本太高。原来种棉花的地，现在大都种了小麦和玉米，普遍机械化作业。

劳动力价格上升，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挑战，也是机遇——其加快了我国农业机械化的进程。2008-2018年期间，我国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从46%提升到67%以上。

畜禽养殖方面也同样如此。养殖企业不断扩大规模，不断改进设施技术，提升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与此同时，我国延续了千年的传统养殖模式，即家家户户院落里养猪养鸡自给自食的方式，除了在西部偏远山区还零星存在之外，已经普遍消失了。

对于山区和丘陵地区来说，粮食生产面临的挑战日益突出。在劳动力成本高企、难以机械化的情况下，农民种植粮食等大田作物的积极性必然大大降低。最后的结果只能是3种情况：摆荒、极端粗放管理、改种高附加值作物（如林果茶菜等）。

从长远发展趋势看，山地和丘陵地区粮食面积减少，改种其他作物，势不可免。对此要有思想准备和正确认识，不必大惊小怪。改种果茶药菜等，也很必要，也是满足人民对美好食物的需要。另外，这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可能更为有利。有些地方，还可以促进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农民工工资不断上涨，也对农村的土地制度产生重要影响。时间越久，影响越大，是大利。

先说土地承包制度。早些年，围绕“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争论不休。但是，近年来，已经很少听到争论了。其根本原因，就是农民工工资大涨。

以前，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靠种地，农民也没有社会保障。因此，土地对于农民，既是生产资料，也是托底性的社会保障。现在，如前所述，农民收入中，务工收入比例已经远远大于种养业收入；同时，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建立，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日益弱化。

以前，外出务工的农民，如果失业了，可以回到土地上，自己耕种，满足基本的温饱。而现在，机械化之后，小规模农户已经基本不可能自己耕种。在市场化条件下，温饱问题就是收入问题。尤其是对于绝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让他们再回农村，既不可能，也没有意义。他们已经不想种地，也不会种地。

当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弱化之后，土地的价值也就仅仅是地租了，并且地租与工资比较，日益无关宏旨。土地的流转，会越来越容易；对“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也就不会再有大的争议了。

对农村的另一种土地——宅基地，农民工工资上涨后，也会很好地缓解其矛盾。时间越久，效果会越显。

农民外出打工的收入越高，就越不愿意返回农村。2005-2016年间，我国农村的常住人口，从7.45亿减少到5.90亿，减少了20%多。而根据城乡建设统计公报，同期，农民住宅面积增加了近50%。这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对于农民来说，是建房资金的浪费；而对于国家来说，是建房土地的浪费。

随着农民外出务工工资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其城市化的意愿日益强化。越来越多外出农民工，已经开始在老家所在的中小城市，尤其是县城和中心镇，购买商品。在当地县城买一套商品房，已经相当普遍地成为农村青年结婚的要求和风俗。他们在农村的老房子，日益成为鸡肋。

未来，农民工工资会继续增加，到城镇特别是县城购买房屋的农民也会更多，日益普遍。当大部分外出农民工都愿意并且有能力到城镇里买房，而不是回老家盖房子的时候，农村宅基地的困境，就会获得较好解决。

用小额贷款“贷”动贫困户复工复产

□□ 文君

日前，在广西梧州市龙圩区新地镇新富回村的山坡上，贫困户李家勇正在忙着种植松树，看着一棵棵小树苗迎风挺立，他的心里充满希望。“在春耕春种时节，扶贫小额贷款为我解决了发展资金短缺的问题。”李家勇说，获得扶贫小额贷款后，他马上买了种苗、肥料、农药，安心搞生产，相信今年脱贫不成问题。

一直以来，各地都把金融扶贫作为加快扶贫产业发展、促进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为进一步降低疫情对脱贫攻坚工作的影响，梧州市龙圩区把扶贫小额信贷作为解决贫困群众发展生产、促进就业、参股经营、增加收入等帮扶的重要举措。通过加强统筹协调，因地制宜，做到应贷尽贷、应收尽收，优化政策，简化业务流程手续；充分利用好现代化信息手段开展扶贫小额信贷工作，帮助受疫情影响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和企业尽快复工复产。

由于这些小额信贷的借款人是建档立卡贫困户，扶贫小额信贷在额度、利率、担保方式、风险补偿机制等方面均有特殊

农民工涨工资有什么影响？

□□ 柯炳生

善待湖北人：战疫才能全赢

□□ 李英锋

华东师范大学今年根据捐赠人意愿特设“湖北新生奖学金”，专项奖励2020年被华东师大录取的湖北生源全日制本科生和户籍、生源地、家庭住址均为湖北的全日制应届硕士研究生，将按照每人5000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奖学金。同时，华东师范大学还设立了“湖北在读学生助学金”和“湖北籍教师助教金”，面向符合条件、受疫情影响停留在湖北省内的全日制本科生和研究生发放1000元/人的补助，为停留武汉的教工发放1500元/人、停留在湖北其他城市的教工发放1000元/人的补助。

华东师范大学的这个决定，引来一片赞声。将特别的爱送给湖北人，与一些地方另一种形式的另眼相待——将湖北或湖北人标签化、病毒化，甚至专门设置“湖北籍厕位”“湖北籍停车区”“湖北籍洗手池”等涉嫌地域歧视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释放了浓浓的暖意和满满的正能量。

病毒不造人，疫情不分地域。在疫情面前，湖北人也是受害者，且受到的伤害最严重。在精神方面，根据灾情规律，湖北人的心态更容易变得敏感脆弱，更容易在意别人的目光和态度，更需要理解、抚慰、尊重和关爱。在经济层面，受市场普遍关停、交通管控、民众长期在家配合防疫等因素影响，很多湖北人的近期收入都处于明显减少甚至归零状态，他们的困难更需要被倾听、被了解。湖北是抗疫的主战场，湖北人为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明显向好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理应回报以守望相助、携手克难的同胞情怀。

积极接纳帮助湖北人既是一种人文关怀，也是一种防控责任。只有帮助湖北人真正从疫情中走出来，全面参与到经济社会秩序的恢复中，重新融入生产生活的每一根毛细血管，我们的战疫才算打赢。



疫情之中，遭受“复工不畅”冲击最重的，是农民工、个体户、中小微企业员工等群体。据观察，东部地区出现用工荒，中西部地区大量务工人员滞留家乡的现象仍旧存在。有人急着养家糊口，却因手持健康码不被外省认可而中途受阻；有人回到了工作地，却难以负担高昂的隔离费用。3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强调，低风险地区之间的人员和货物流动，必要的健康证明要做到全国互认，不得再设置障碍，不对人员采取隔离措施。

这正是：

健康码码阻前行，高昂隔离意难平。
复工不畅影响大，无理障碍要喊停。

文 @十八刀



更多三农评论，敬请关注农民日报社评论部微信公众号：重农评。

“县长直播”蕴含的三重逻辑

□□ 韩啸



新冠肺炎疫情来袭，与之相伴的是各种新业态荣发滋长。针对不少地区出现的农产品滞销难题，一些县长化身“网络主播”推介地方特色优质农产品，引来市场和舆论的积极反馈。农民日报社三农发展研究中心抓取的数据显示，从2月1日到3月11日期间，微博、微信、今日头条等网络信息平台共发布了8357条有关各地“县长直播”的新闻报道。

在笔者看来，这其中蕴含的三层逻辑令人深思：

第一，“县长直播”与农业产业化、品牌化相得益彰。“县长直播”带来的最直观感受，是一串串“亮眼”的数字：安徽临泉县县长梁永勤短短1小时搞定了2.7万个订单，将凉拌芥菜卖断了货；广东徐闻县副县长徐康秀直播两小时售罄30万斤菠萝，创造了直播带货的“徐闻模式”……然而，“县长直播”的作用绝不仅仅体现在销售数字上，背后还描绘出我国多年来在农业产业化、品牌化深耕的图景。

选苗育种、生产种植、精深加工、市场营销、包装物流……手机屏幕上呈现出的小切口，背后却需要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规模化建设、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等一系列产业基础的支撑，这样才能对应电商平台带来的巨大的流量效应和现代市场流通的要求。

在近期的“县长直播”中，可以看到“砀山酥梨”“赣南脐橙”“云南鲜花”等一个个响亮的名字，县长们正是借助这些区域公用品牌、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企业品牌来汇聚和展示产品特色，让品牌农业成为推介的着力点。

随着5G的深入普及，VR和AR等虚拟、沉浸式技术应用日渐成熟，直播形态将会愈发多元和自由，将会为观众提供极其丰富的消费体验。这必然会对整个农业产业链的构造及品牌化的推进提出更高要求，也将直接推动和优化各种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分配，在市场需求、农业生产集群和农户之间形成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品牌化塑造和一体化经营的现代农业产销模式。只有夯实农产品产业化、品牌化的扎实根基，县长的“流量”才能持久高效地带动农产品产销机器的高速转动。

第二，“县长直播”可推动互联网更多更好地普惠“三农”。近年来，尽管使

用互联网的人数和比例在不断增加，但“数字鸿沟”几乎在所有国家依然存在，甚至有扩大的趋势；在互联网应用领域，联合国去年发布的《2019年数字经济报告》就描述了不同地域间数字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现象。伴随着互联网在城乡间的扩张，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结构等背景因素交织，原有的差异很有可能被进一步扩大。

由此可以推断，互联网本身并不存在自发的普惠性。我们不难发现，在基于网络架构的供给链中，工业品下乡容易了，但农产品上行还困难重重；以资本力推动的文化娱乐消费向乡村的渗透多了，但农民工通过互联网获得平等的市场参与机会依然乏善可陈。一时间，“下沉市场”成了兵家必争之地，一些互联网商业主体仅仅将农村视作巨大的潜在市场。笔者听闻一些互联网公司自嘲为“刷墙公司”——连农村民居的白墙都成了可以攫取的资源。

而县长们开启“直播带货”，展现出一种互联网提供的平等分配社会资源、主动参与市场竞争及提振生产的方式；通过权威性的示范，让农业从业者可以看到，互联网不仅可以提供各种各样好玩儿的好吃的好看的，还可以提供创造价值的机遇；当农民以“主

播”的角色进入互联网构架的生产关系中，便对自己的产品有了“最终解释权”，成为了平等的市场主体，能够借助互联网的力量扭转农业产业链上价值分配不均衡的状况，实现互联网普惠“三农”。

第三，“县长直播”营造出新的政治生态。县长作为管理一个县的行政事务的官员，早已完成了从道德权威向行政职能的转变，大事小情不仅要管，还要管得好。在直播中，不少县长呈现出“两种气质”：既有静水流深的庙堂正气，也不乏田间地头的人间烟火。越来越多的县长选择走进直播间，说明当下的行政决策嵌入了越来越多的“服务”元素，一些县长更是在直播中“烤地瓜”“品泡椒”“炖梨汤”，对新生事物不仅不排斥，还积极融入个性化元素，这既表现出张开双臂迎接新业态的诚恳，也体现出转变工作作风、勤政为民的态度。

当县长们满怀热情的投入到服务业、服务企业、服务农民的工作中，探索出一种更接地气、更容易被公众所接受的工作方式后，势必会将影响扩散到各级政府部门作风、转观念的行动中，从而营造出崭新的政治生态；未来是否会有“直播接访”“直播问政”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也变得尤为可期。